毛泽东两下岳阳,指导铁路工人罢工

▲图为1922年中共岳州铁路工人小组所在地——岳阳车站

一下岳阳

1921年12月的某日,冬日阳光和照。身穿长袍,脚蹬布鞋,蓄着长发,一脸刚毅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新河火车站工人共产党员程地广、卢士英二人陪同下,来到洞庭湖东岸岳阳城南吕仙街与鄢家冲交界处的一栋石库门二层建筑"广东大院"(广东籍工人住处)。他们找到程地广的好友、风泵修理工陆汉湖。

通过接触,毛泽东看出这是一个很有觉悟的工人兄弟。他介绍陆汉湖成为岳州第一名中共党员,并在石库门楼上秘密召开了十几名先进工人会议,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建立工人俱乐部、工会、党团组织的重要性和方法等。

很快,陆汉湖吸收了熊巽泉、孙康照、蔡康庭三人为中共党员。

1922年春,中共岳州铁路工人小组成立,陆汉湖任党小组组长,自此岳阳破天荒地有了中共第一个党组织。

1922年8月,毛泽东派郭亮来岳阳加强工人运动的具体领导,很快成立了工会,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夜校。

工人们向郭亮反映,最令他们头痛的是两件事:一是监工虐待工人,二是路局拖欠工人工资。要求俱乐部领导他们同路局斗争。

恰在此时,监工张恩荣、员司(翻译)苗凤鸣私带鸦片上车,要工人阮康成看管,阮不同意,遭张、苗等人殴打,工人吴青山等买米经过,路见不平质问,反被诬告偷米偷煤。郭亮立即以岳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名义向鄂段路局长王世堉抗议,要求革除张、苗二人。王世堉拒绝,还将工人阮康成、吴青山开除。工人们闻之义愤填膺,郭亮认为发动罢工斗争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接到郭亮报告后,批准了郭亮的请求,立派何叔衡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武昌徐家棚等车站工人一起来响应。

二下岳阳

1922年9月8日,毛泽东在罗权陪同下,再次来到岳州。在"广东大院"楼上陆汉湖家,毛泽东与郭亮、陆汉湖、熊巽泉等人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中共湘区联络中共武汉区委组织粤汉铁路工人联合罢工情况,并分析当前形势,详细讨论了罢工方案、罢工时机及具体应变措施,决定9月9日上午8时举行罢工。当晚,毛泽东又参加了俱乐部部员会议,一致决议以开除张、苗为第一条件,并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待遇。

在长沙坐镇指挥

9日清晨,毛泽东赶回长沙,在新河车站坐镇指挥,发动与协调湘鄂两省铁路工人支援岳州车站工人的罢工斗争。

9月9日8时,粤汉铁路大罢工正式开始。昔日往来如梭的火车瘫痪在那儿,当局慌了手脚,派来武装镇压,打伤工人百余人,失踪10多人,9人被捕。消息传来,毛泽东立即向报界揭露军阀政府暴行,罢工继续。

11日凌晨,郭亮带头卧在铁路上,工人们也一起参加卧轨抗议。王世堉强迫司机王忠开车,但王忠在郭亮的义正辞严下,毅然将火车停下来。王世堉气急败坏向湖北军阀求援,萧耀南派兵来岳镇压,打死6人,打伤60多人,郭亮等7人被捕,押往武昌监禁。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立即赶到新河车站召开铁路工人大会,通报军阀罪行,通电全国,吁请援助。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响应,捐款源源不断汇到。罢工持续10天后,武汉、京汉、陇海等各工人团体、铁路工人在汉口江岸集会,决议如到25日得不到解决,则举行总同盟大罢工。至此,交通部与直系军阀慌了手脚,不得不于25日分别急电王世堉、萧耀南,令其速将工潮解决。

25日下午,王世堉特邀请工人代表谈判,并达成协议,工人在罢工中所提要求均予满足,郭亮等被捕人员全被释放,罢工最终取得胜利。

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车站举行了成立大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数千里铁路线上,北有林祥谦、施洋,南有毛泽东领导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和粤汉铁路总工会,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摘自《文史博览》李连芳/文)

海辽轮:第一艘起义的商船

1953年版人民币的5分纸币上印着一艘巨轮,这艘巨轮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第一艘起义的商船——海辽轮。1949年9月,该船在应国民党军差遣从香港开往汕头的途中,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船长方枕流的精心筹划下,历经艰险成功地驶进解放区大连。

方枕流原本是四川万县海关船上的大副,和船长刘双恩(中共地下党员)朝夕相处,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9月,国民党命令海辽轮从香港起航前往汕头接运军队,方枕流觉得时机已到,开始策划起义。

方枕流与船上的积极分子组成了起义核心小组,对船员进行思想鼓动,增强起义信心。他们故意报告船只需要修理以拖延时间,迷惑敌人。9月18日,香港海面大雾,方枕流下令秘密开航,并在途中宣布起义决定,全体船员积极响应。饱受国民党压迫的船员们纷纷表示支持起义,决心与船长共同奋斗到底。

起义后的航线充满惊险,方枕流和起义核心小组动员全体船员伪装船貌,涂掉船名,改变悬挂国旗,以避免敌人侦察和轰炸。他们还与敌人周旋,虚报开航时间和船位,争取时间。经过八天九夜的艰苦航行,海辽轮于9月28日成功抵达解放区大连港。

中共中央办公厅驻大连办事处主任徐德明等领导前来慰问,起义船员向党中央发出致敬电,表达归属感和为新中国事业努力的决心。10月1日,海辽轮庄严升起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毛主席回电祝贺起义成功,并号召全国海员效仿。

海辽轮光荣起义的消息,有力地鼓舞着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原招商局和许多流转海外的广大海员。他们纷纷群起效仿,通过秘密串联,1950年1月15日,停泊在香港的13艘海轮,在香港招商分局的组织下,同时升起五星红旗,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此又激起滞留在港、澳和南洋的中兴、民生、海鹰、中华等民族私营航业的21艘海轮的北归。广大海员和私方航业人员回到大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摘自《老年生活报》荣华/文)

晚清可分期买房

追溯历史,分期和按揭都不是新鲜事物,分期购房曾经在清朝时期的北京盛行,按揭购房曾经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盛行。

清朝时期北京的分期购房,仅限于旗人。清朝前期对旗人施行的是免费分房政策,原则上,一品官分20间,二品官分15间,三品官分12间,四品官分10间,五品官分7间,六品官分5间,七品官分4间,八品官分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没有工作的普通旗人每人分两间,只要是旗人,人人有房住。

后来公房不够分了,旗人内部苦乐不均,清廷开始搞房改,免费分房变成了"福利购房"——朝廷按优惠价把公房卖给旗人,一家只许买一所,.不许多买,不许骗购。然而,即使按优惠价,也有一些旗人买不起,不能一次缴清房款,于是,从乾隆年间起允许分期付款,房款在千两以上的,可以首付一半,剩下的8年之内付清。

嘉庆即位后,旗人分期购房成为定例,无论总价多少,都是首付一半,还款期限则视房款而定,500两以上的7年付清;300两以上的6年付清;100两以上的5年付清;如果房款在100两以下,限4年付清。旗人分期购买公房无需付给朝廷利息,只要在朝廷规定的还款期限内还清就行了,这也算是朝廷对旗人的一项优惠政策。

(摘自《北京晚报》李开周/文)

康熙南巡到底花了曹家多少钱

三织造撑起皇家排场

作为自己曾经的伴读、保姆的儿子,曹寅(曹雪芹祖父)之于康熙的意义非同一般。其父曹玺过世后,曹寅于内务府内轮值,曾任广储司、会计司、慎刑司郎中,经过此番管理培训生式的历练,加之二人的亲密关系,康熙将曹寅放到江南重要的织造位置上并不意外。更不要说,作为心腹,曹寅还担负着为皇帝打探情报、笼络人心的任务。

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先是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转任江宁织造,其姻亲李煦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亲征噶尔丹大获全胜,曹寅适时上密折奏请康熙南巡。此番邀请时机正好,康熙三十八年(1699),距离上次南巡10年后,康熙再次启程。

此后,料理康熙的南巡事宜变成了曹寅乃至李煦的重点差事。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度南巡之前,康熙给江南三织造专门下了一道指示:"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结果是,三织造"一意孤行"将超标接待进行到底,皇帝也受之不却。南巡的排场在主仆的推拉中铺陈得越来越大,以第五次在扬州修建三汉河行宫最甚。

早在康熙四十三年初,康熙在给曹寅的密折中就透露出"明春朕欲南方走走"的想法。十二月上,曹寅就反馈道,因两淮商民期盼圣颜,便"集资"在扬州高旻寺修建一座南巡行宫,自己不忍阻挠,如今快竣工了特来禀报。康熙回复:"行宫可以不必。"对曹寅的先斩后奏,他并没有生气。

曹寅无疑是此次南巡的大赢家,未及返京,回程途中,康熙就下了一道谕旨:"因江苏织造预备行宫,勤劳诚敬,江宁织造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苏州织造李煦加授光禄寺卿。"除此之外,曹寅还领命刊刻《全唐诗》。将如此重要职位且可名留青史的差事一并托付给曹寅,康熙的信任与偏爱无须多言。

"虚热闹"与"真亏空"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所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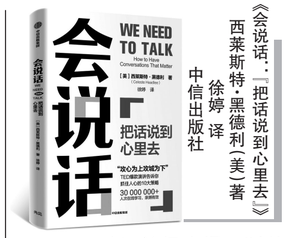
按照这笔预算,想达到以上盛景,是极难的。尽管权掌织造重点部门,又充当着皇帝耳报的角色,曹寅的固定工资不过每月105两银子外加五斗米。按他在奏折中的说法,三汉河行宫的修建是众盐商"顶戴皇恩"的自发行为,但其实,曹寅、李煦二人还各捐了2万两。在扬州,曹寅连同另两位大臣设宴摆桌,也是一大笔花销。皇帝也会给官员一些回礼,只是总共不过千余两银子的价值,荣宠象征更甚。

康熙六次南巡,前三次间隔5年、10年,从第三次开始,每隔两年便进行一次,频繁接待如此大型活动,让如曹寅等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回血"。就算是以盐商名义建献的部分,日后多少也是要"回馈"回去的,是难言之隐,也是心照不宣。

曹寅和李煦等人办下的南巡差事,让乐于看到其治下盛景的康熙很是满意,但他也并没有幻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早在第三次南巡以后,安徽布政使就被查出有亏空库银的事,原因是"为供办南巡所致"。曹寅忙活这一番,皇帝也心中有数:"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

为此,康熙陆陆续续给了曹寅不少"机会"。除了让曹寅和李煦轮流每两年兼一任两淮巡盐御史,还特批曹寅和弟弟曹宣负责采办五关(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铜觔。这些肥缺每年大约可给曹、李二人带来58万两银子的盈余,除其中23万两需要拨充江宁、苏州两织造署充当经费,剩下的没有明指,但都全算作拨给两人弥补亏空。就像接驾所费没有一个明确的花销,曹寅和李煦到底亏下多少钱也是个谜。(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刘瀛璐/文)

以诚相待,你就赢了



2009年,曾经火爆一时的达美乐比萨连锁店已经日薄西山,濒临倒闭。公司销售额一落千丈,股价也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司制作的比萨这时也在全美美食大赛中得了最后一名。

管理人员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否则公司将面临破产。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做法。达美乐上线了一系列广告公关,坦荡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公司以前做的比萨太难吃了。

在一则电视广告里,它引用了顾客的各种差评,比如有人吐槽达美乐比萨的底饼就像"硬纸板"一样,是"最难吃的比萨,没有之一""完美地避开了跟好吃有关的一切"。在广告里,顾客们这些扎心的差评都被打印出来,并用画框裱了起来,挂在了达美乐办公室的墙上。这时,画外音宣布达美乐推出比萨新品,并恳求顾客再给它一次机会。

达美乐的CEO(首席执行官)事后承认,自己在决定推出这则广告的时候,其实忐忑极了。因为这则广告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幸好事遂人愿,这次危机公关被誉为餐饮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扭转乾坤之作。第二年,达美乐的销售业绩涨了接近14%,股价也上涨了130%。这家公司把赌注都押在了诚信上,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就像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约翰·格拉斯所观察到的:"人们已经太习惯听广告里说的假话了。当你坦诚相待时,反而赢了。"

讲故事的力量

余华和莫言、苏童、王朔,四位作家1998年一起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主办方的题目是:你为什么写作?

余华写的是,自己不愿意做牙医,想不上班,写小说找寻自己。莫言写的是想给自己买一双皮鞋,写小说发表就有稿费了。只有苏童实实在在地说他当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学里面如何热爱上了文学,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等到前面三人演讲完毕,苏童死活不愿意念他的稿子。他说:我太愚蠢了,我怎么会说我是热爱文学才走上文学的道路!我应该跟你们一样,瞎编一个。

这段故事出自余华的采访,说明三件事:首先,作家们善于讲故事,真会编;其次,余华的采访真会说,他惯于用幽默的方式来传达信息,提高传播率;最后,一个段子就可以同时刻画好几个人物形象,作为"梗"的苏童莫名给人留下了憨厚朴实的印象。

人的本能是喜欢听故事的,这让故事充满力量。莫言在领诺贝尔奖的发言时也都是在讲故事,讲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些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被更多人理解。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让鲁迅给他们办的《新青年》杂志提意见,鲁迅就说,这些论说不行,要想影响广大民众,得写白话文小说。果然,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出,传播很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鲁迅的杂文《我之节烈观》跟《狂人日记》写于同一年,两者都是批判当年封建礼教"吃人"的制度。同样的话在《随感录》里说,和在《狂人日记》里说,效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小说的力量。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曾宣传过很多年陈延年烈士的事迹,但效果一直不太明显。直到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才引起巨大的轰动,每到各种节日,许多人去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烈士墓前拜祭献花,微博上陈延年等烈士们的超话(超级话题)也一直非常活跃,把当下的心事向他们倾诉,饱含深情。这就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故事蕴含的巨大力量。

《觉醒时代》的编剧龙平平一直想写陈延年的故事,他查找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陈延年和陈乔年去过北京和陈独秀一起生活的历史资料,把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物的关系有机地勾连起来,在与陈独秀的情感冲突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彰显出他的伟大人格。这种人物的关联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人物在关系和场景中更有温度。《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形象非常立体,正直、勇敢、温暖,这样闪闪发光的他失去美好的生命让当下的人们无限共情。

(摘自《意林》闫晗/文)